

关于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关于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几点思考

关于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段时期以来，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和多元化服务组织成为社会各方面热议的话题。本文结合十八大报告精神的学习和农业农村实际，就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谈点认识。

一、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是前提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亿万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完善，因地制宜地创新。必须始终明确，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家庭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层次，农业经营体制不管如何创新，都不能违背这个基本点。

在很多人看来，家庭经营是个落后现象，尤其是中国的家庭经营规模都很小，觉得家庭经营能现代化吗？我认为，规模是国情决定的、资源禀赋决定的，但是不是搞家庭经营，是由农业产业规律决定的。无论是从产业的特征规律来看，还是从世界农业的发展规律来看，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经营中最有效的一个主体。家庭经营方式管理上最简单，监督上最简单，所以也是最有效的。

这是因为农业是个十分特别的产业。农业是生命生产过程。我们1的农民是很了不起的。第一，他所有的劳动对象，无论是庄稼还是畜牧水产，都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体每天都在起变化，这种变化要非常非常留意，才能细微地观察到。第二，传统农业是露天的，是在大

自然之中。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一年四季、风霜雪雨。这两个变化结合在一起，在分析判断其综合作用之后，才能采取最有效的措施，让生命获得最好的生长，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让农民这么去关心气候的变化，这么去关心庄稼的生长？只有当土地是农民的，生产的产品归他所有，或者劳动成果与他的个人利益直接关联，他才会尽心尽力地去操劳。否则，农民不会有积极性，他把你哄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即使知道，也已经迟了，因为季节错过了。人民公社之所以发展不下去，就是因为农民感觉到种的不是自己的地，打的不是自己的粮，所以不关心生产的好坏；包产到户之所以发展得很好，就是因为农民觉得这是我的地、我的粮，所以就认真地管理。因此，在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过程中，要尊重农户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真正做到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不能强制或者限制农民对土地的流转，这是一个底线。同时，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让农民平等参与农业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农业现代化成果。

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的发展，有些领域企业化经营也许是有优势的，但是对绝大多数，尤其是大田生产的农业来说，还是要靠家庭。现在主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更多的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

合作组织，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事情，而不是更换经营主体。因此，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不是要去搞一个新制度，而是要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通过机制创新，更好地激发家庭经营的活力，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

二、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是重点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集约化生产是目标，专业化管理是手段，组织化经营是路径，社会化服务是保障。农业集约化是发展现代农业、

繁荣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农业专业化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标志。实现农业集约化和专业化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需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在组织化经营的覆盖下，分散生产和经营的农户也能够得到健全良好的社会化服务。因此，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重点是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要在支持普通农户提高生产集约化程度的同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当然还应包括我们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既要注重引导一般农户向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方向转变，又要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等多种类型、多元化的农民合作社，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不断提高农户生产经营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的同时，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形成农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新型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二是要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组织化程度，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服务主体是保障现代农业能够持续稳定向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我们提出的要构建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主体应包括：第一，是我们的村委会（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要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能力、发展能力、服务能力，同时要提升他们为农民服务的水平和能力；第二，是通过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来培育多元化的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第三，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这些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起到了开拓市场、带动农民、增加收益、创立品牌的很多作用，这是我们要大力扶持的。此外，服务主体还有其他的方面，包括和农业相关的一些农业、气象、供销合作社以及科研教育单位，还有一些其他的中介组织都是我们需要支持和培育的。总之，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既要建好用好‘国家队’，

也要培育打造‘地方军’、形成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格局，努力为农民提供全方位、低成本、便利高效的生产经营服务，提高农业组织化、社会化程度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三、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是落脚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很快，农村的面貌变化很大，农民得到的实惠很多。主要表现为：粮食产量连续九年获得丰收，农民收入连续九年较快增长，农村贫困人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转移；农村的社会事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农村的社会管理在进一步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在重重困难

中奋进立下汗马功劳。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业呈现高成本、高风险、资源环境约束、青壮年劳动力紧缺的态势。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严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任务十分艰巨。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落脚点，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是我们衡量创新体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和标准。应对新挑战，再上新台阶，必须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在体制机制上寻求新突破。所以，只要是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只要是能够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都应该允许群众去创造、去大胆的试和大胆的闯。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农业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生产力大大发展，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各类新型经济组织发育成长，社会化服务更加便利。我们应当顺应时代变化，遵循发展规律，努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充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潜能，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内生活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

第二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第一财经日报 李秀中 2014-05-28

核心提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4月29日，正是栽秧的繁忙季节，王志全安排了50多人忙着抢种。作为成都崇州市隆兴镇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他管理着1000多亩田地。完成合作社每年制定的生产计划，王志全能够分享两成的收益，年收入8万~9万元。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成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新鲜产物，其发源地崇州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由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它类似于建筑业的承包商和工商业的职业经理人。当天，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的嘉宾还参观了王志全所管理的地区。

而在此前几天，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以及中央农村工作的智囊们，联合在崇州召开了对这一新鲜产物的课题研究。专家们将此定义为“农业共营制”。

成都崇州的试验就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

课题组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课题组另外两位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强调，崇州的这一试验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别的地区推广复制。

□□“CEO”□□

杨柳土地合作社成立于近年，当时村民以确权颁证后的 101.27 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 101.27 亩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经营权年限，每亩作价 900 元出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这也是全国第一宗农民没有出钱，而是纯粹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工商注册的合作社。

杨柳土地合作社理事长陈永建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当时的状况是一些 80 后、90 后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也不会种了，只有老年人种地，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采用机械化的方式耕作。

集中起来的土地如何经营是合作社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当时，崇州市农机局职工周维松办起了农机合作社。杨柳土地合作社就聘请周维松作为生产经理，指导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不过，周维松不收取分红，只是在耕作时收取农机服务费，这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雏形。

3 年之后，王志全接受聘请担任了杨柳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其分配机制是按照 2：8 比例与合作社分享生产收益。即扣除生产成本之后，两成归职业经理人，八成归合作社。2013 年改为 1：2：7，即提取一成的合作社公积金、两成收益给职业经理人，七成收益用于合作社土地入股的分红。

陈永建介绍了这一运作模式：由合作社提出当年的生产计划，即每个季节种植什么作物，职业经理人执行这一计划，并根据计划提出成本预算，再交由合作社股东大会审议，合作社通过后按此成本支付职业经理人成本费用，待到收获后，再对收益进行分红。其中，职业经理人必须确保保底收益，否则要赔偿损失。

可见，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和公司董事会与 CEO 本质相似。王志全告诉本报记者，他每年能够收入 8 万~9 万元。他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长，后来又成都打工，做起了装饰。后来回到崇州在其所在村流转了 80 多亩地，成立了志全农业合作社，随后受聘成为杨柳土地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

作为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负责这些田地的生产经营，一方面需要种植技术，另外一方面则需要管理能力。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从 100 多亩发展到 1500 多亩，这么大的面积对他是一个考验，王志全将其分

成 4 个经营小组，又安排了各组负责人，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经营团队。

像王志全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已经批量涌现。目前，崇州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5960 余人，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 1460 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 767 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而这一现象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效果也是积极明显的。

前述课题组研究发现，由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 10%，约 110 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 15%，约 90 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 40% 以上）。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崇州试验的星星之火已在成都形成燎原之势。目前，成都市已有农业职业经理人 7903 名，他们活跃在全市 19 个区（市）县的田间地头，在现代农业中大显身手。而当地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助推这一创新快速发展。

2012 年以来，成都市农委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试行意见；成都市农委、财政局、科技局、人社局等出台了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管理规定，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考核管理体系。

2013 年，成都安排农民培训专项资金 1200 万元，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资金 500 万元。给政策，对农业职业经理人领办、新办生产基地给予补贴，支持他们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个人应缴的 20% 缴费基数，由财政补贴 12%。

创新带来的可期前景以及良好政策的助推，加速了现代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职业经理人通过规模化生产增加收入，高于外出打工收入，同时照顾了家庭，使得一部分农

业能手回流；另一方面，吸引技术人才进入，2013 年年底，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有 7 名 30 岁以下的大学生竞聘职业经理人上岗。

在解决谁种田和科学种田的同时，也催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的建立。因为农业职业经理人执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必然要采购众多的社会化服务。为降低服务外包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农业职业经理人专职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由此又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

这些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苗）、病虫害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9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不仅如此，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扩张，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经营管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业品牌服务体系应运而生。比如，崇州先后试点了“五权”公开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获得金融机构贷款7.5亿元。

显然，崇州试验与普遍的土地流转有着显著不同。首先社员是经营主体，农民对土地有控制权，种什么农民说了算，而且社员有退社自由，农民获得的是收益分红而不是租金；土地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小麦、油菜等粮油种植，而土地流转有的用于非粮生产，比如花卉苗木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

提供可复制经验

成都崇州的试验正触碰中国农业的根本瓶颈，吸引罗必良和程国强来做此项研究的正是它的可复制性。他们都来自湖北，希望通过对这一做法的研究总结，能够在自己家乡进行复制，以及形成全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一个方向。

罗必良表示，就全国总体而言，30多年来，农业经营体制的“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的大格局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

这个重大变化体现在：一是土地细碎化，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二是农户兼职化，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三是劳动力弱质化，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与妇女化特征；四是农业副业化，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五是生产非粮化。

罗必良表示，上述变化共同表明了农业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他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已经广泛存在，势必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

罗必良认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最为棘手的瓶颈难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成都崇州的试验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形成了“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

罗必良表示，崇州试验的创新价值与启迪意义在于其三大交易装置的形成。一是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并达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装置。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改善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三是农业生产性服务超市，促成了农业的技术分工与生产操作效率。

罗认为，崇州的“农业共营制”作为新形势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创新，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第三篇：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范文]

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

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战略构想。20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围绕这个战略构想进行了总体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背景下，重新认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家庭经营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

农户家庭经营、公司农业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容性。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国通过农村改革构建了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农户家庭经营“小而全”、“小而散”的格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往往绕不开如何对待这种传统的农户家庭经营的问题。进一步说，这种“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能否通过转型提升，有效转化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在可预见的将来，至少在大多数常规的农业生产领域，农户家庭经营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并具有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当然，农户家庭经营的这种比较优势往往不一定表现在单纯的经济方面，而是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如许多公司农业经营不愿种植利润率较低的粮食作物，喜欢种植高度出口导向的非食品作物。大面积采用公司农业经营替代农户家庭经营，容易加剧农产品供求结构的矛盾，形成对局部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毁灭性破坏”，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①。缺乏相关经验导致管理失误等农商企业内部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公司农业经营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从国际上看，20 世纪 80 年代后，墨西哥支持外资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②。当时，墨西哥在降低农产品关税、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放宽对外资投资农业的限制，并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分得土地的农民，允许农民通过土地买

由此造成墨西哥农业生产结构转向以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为主，粮食等大宗作物生产在跨国公司的挤压下迅速萎缩，粮食由自给自足转向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农业产业链甚至农业的土地经营和技术选择日益受到跨国公司控制。这些农业跨国公司很少直接投资农业生产，而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利润更高的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导致农业利润大量外流，农民只能获得产中环节的小部分利润。跨国公司主导的农业技术选择主要服从于大规模农场的需要，导致普通农户缺乏获得技术进步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被迫进入城市贫民窟。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部分地区向工商企业的土地流转过快，推动了农业“非粮化”提速，增加了危及粮食安全的隐患。部分地方政府变相强迫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工商企业，也容易增加工商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蓄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与粮、油、棉等大宗农产品密切相关的生产领域，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导形式，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引导我国“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实现转型提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由于农户家庭经营的高度异质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经营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也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农户家庭农场具有运行企业化、经营市场化等特征，它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容性，往往不是我国“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所能企及的。在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上，既要看到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形式的合理性，又要看到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的局限性。

第二，总体而言，家庭经营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环节。而随着农业发展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农业产业链运行中消费者主权的强化和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提高，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农户家庭经营的比较劣势在某些方面迅速凸显，这种状况对于“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更是如此。

第三，即便是在农业生产环节，农户家庭经营也并非在所有领域

天气影响较小的集约型养殖业中，公司农业经营相对于家庭经营的比较优势正在日趋凸显。

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和局限性。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而言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及其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局限性。我国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以“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在农业发展上存在着“重生产、轻服务”、“重政策优惠、轻制度建设”等倾向。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深入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和局限性日趋突出，对于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制约迅速显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妨碍农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增加了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中，“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同质性，缺乏分工协作，加剧了我国农产品成本高、农业经营效益低和农业竞争力弱的问题，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相距较远。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以“小而全”、“小而散”为主要特征的农户家庭经营，还容易加剧农户兼业化、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老弱化的问题，导致以农为辅的兼业经营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形态。由此会推动农业经营粗放化、农业技术选择简约化，甚至会导致农业商品化出现退化，加剧农地撂荒和农机等设施的闲置，制约农业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容易导致农户的农业经营日益偏离农业发展的效率目标，弱化农户推进农业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动力。

第二，难以实现资源利用、科技应用、市场拓展和抵御风险等方面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妨碍农业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对大量家庭经营的农户而言，许多影响深远的资源利用、科技应用、市场拓展和抵御风险活动，包括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农户缺乏参与的动力甚至能力。农户之间“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也往

比如，在农作物制种、动植物疫病防治时，少数农户的不参与甚至会导致多数农户的参与“无功而返”。许多地方在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治、实行农产品原产地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以及推进农产品优质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经营时，往往面临较大困难，与此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农业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难以提高，甚至农业经营粗放化和欠组织化，以及农业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户行为的“理性选择”。

第三，加大农业产业链协调整合的困难，将农户推向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如前所述，农户家庭经营的主要优势领域在于农产品生产环节。但是，如果将研究的视野从农业生产环节“切换”到整个农业产业链，特别是农业的产前、产后环节，如农资采购与供应、农产品物流与营销、农产品加工和储藏保鲜、农产品安全和品牌建设、农业金融保险或农产品期货市场等领域，农户家庭经营的比较劣势就会迅速凸显。与此相对应，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优势领域也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环节。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竞争已由产品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经营体系在农业产业链竞争中的比较劣势日趋突出，对于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制约迅速凸显。况且，随着全球范围内产业融合的深化，农业产业链的服务环节日益成为农业产业链或价值链的主导者，成为农业产业链资源整合、优势集成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农业产业链的利润重心也逐步呈现向农业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这会进一步加剧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与局限。

一般而言，“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难以实现有效组织，难以联合起来与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农业产业链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工商资本（包括服务业企业）抗衡。因此，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不仅会加大农业产业链协调整合的难度，增加农户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产业链对接的困难，还会推动农业产业链运行中工商企业垄断格局的形成和“企业控制产业”现象的发

利益分配的边缘，制约农民增收，甚至导致农户在农产品市场竞争和价格决定中日益陷入“被动接受”的地位。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许多地方农民“承担风险多、获得利润少”，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阻隔农业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对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促进作用，影响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产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机结合的产物。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外在表现；农业需求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引擎；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基；农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载体。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由于在产业链协调整合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往往导致农产品市场需求的信息难以有效传导给农业生产者，加大农产品供求协调和价格实现的困难与风险，不利于发挥需求结构优化升级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作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由于妨碍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容易加剧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降低农业发展对优质资源、优质要素的吸引力，甚至导致农业发展中优质要素的外流。这又会制约农业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侵蚀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基。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农业组织创新的滞后，不仅容易削弱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业产前、产后环节争夺利润的能力，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工商资本的谈判能力，还容易导致农业组织创新滞后成为制约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的难点，增加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妨碍农业产业链整体素质和增值能力的提升。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哪些基本特征？概而言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四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产物。

我们认为，所谓集约化，是相对于粗放化而言的。新型农业经营

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正是为了消除近年来部分地区农业粗放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集约化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单位面积土地上要素投入强度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和投入结构的改善，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力资本、现代信息、现代服务、现代发展理念、现代装备设施等创新要素的密集投入及其对传统要素投入的替代；三是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善，包括要素组合关系的优化和要素利用效率、效益的提高。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创新能力，但也对农业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推进农业集约化，往往是发展内涵型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

所谓专业化，是相对于兼业化，特别是“小而全”、“小而散”的农业经营方式而言的，旨在顺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更好地通过深化分工协作，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的资源利用率和要素生产率。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农业的专业化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的专业化。如鼓励“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向专业化发展，形成“小而专、专而协”的农业经营格局。结合支持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培育信息服务、农机服务等专业服务提供商，也是推进农业专业化的重要内容。第二，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如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产业区，以及美国的玉米带、大豆带等。从国内外经验看，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区域规模经济，是发展区域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专业化的深化，有利于更好地分享分工协作效应，但也对生产和服务的社会化提出更高层次的期待。

至于组织化，主要是与分散化相对应的，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的发育及与此相关的农业组织创新。第二，引导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之间加强横向联合和合作，包括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等，甚至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产品行业协会。第三，顺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

提高农业产业链的分工协作水平和纵向一体化程度。培育农业产业链核心企业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能力及其带动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能力，促进涉农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等，增进农业产业链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均属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社会化往往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社会化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参与；二是农业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农业产业链，换个角度看，也是农产品供应链和农业价值链。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参与，顺应了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的趋势。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链主要驱动力正在呈现由生产环节向加工环节以及流通等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引领支撑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这些方面均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参与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分享，不仅表现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还表现为随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产业链逐步升级，并与全球农业价值链有效对接。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农业产业链消费者主权的强化和产业融合关系的深化，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利益主体参与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深化，以及农业产业链与能源产业链、金融服务链的交融渗透，都是农业发展成果社会分享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农业发展过程社会参与和分享程度的提高，增加了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通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促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的成长、增进其相互之间的联合和合作等，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环节的利益，避免农业产业链的利益分配过度向加工、流通、农资供应等产前、产后环节倾斜，有利于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多数农产品供应链日益由线性的单链转化为非线性的网链。因此，农业经营体系社会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网络化。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推进网络化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集体转变成本和需求规模经济的存在，旨在提升网络效应。^③许多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局部区域内农业经营体系网络化的结果。农业经营体系的网络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07130163135010012>